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特质

黄加文,巫青山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习近平大历史观构建了一个彰显开放性、科学性与人民性的复线历史谱系。在理论视域上,是一种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连续多元的历史发展观,旨在实现历史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统一,呈现开放性;在理论思维上,强调在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中准确洞察历史发展的真相和原貌、科学考察历史发展的情景条件和系统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体现科学性;在理论立场上,强调在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活动交织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凸显人民性。

关键词:习近平大历史观;开放性;科学性;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2-0143-08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导引,将历史认知与时代使命紧密结合,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创造性提出“大历史观”理论,并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进一步强调,“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②。这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中国实践特色的创新成果,成为观察我国社会发展的视野、观照世界历史发展的视域、正确看待历史的标准,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当前,国内学界围绕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思想渊源、形成发展、内容特征及其价值意蕴等展开了阐述与剖析,积累了众多富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既有成果在理论特质上的阐释仍存在提升空间。基于此,有必要从理论视域、理论思维及其理论立场中进一步深挖习近平大历史观内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以促进大历史观理论的深化研究。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鲜明特质,生动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境界。深入研究习近平大历史观蕴含的理论特质,不仅有助于我们洞悉其内在的独特价值与优势,更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实践指引。

一、理论视域的开放性

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是历史观的问题域之一。如何看待各国历史文化?“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③面对这些问题,与意图割裂传统与现代、对立过去与现在而同时推崇一元化历史解释的路径迥然不同,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理论视域上呈现出鲜明的贯通开放特性。

收稿日期:2024-08-1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10)

作者简介:黄加文(1968—),男,江西九江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②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③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一)大历史观在历时性上具有贯通古今的连续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审度,历史、当下与未来是相互贯通、具有逻辑关联的有机统一体,三者内在地蕴含着实践层面的同构性质。无论是对历史的追溯、当下的审视,还是对未来的构想,均根植于“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之中。据此,过去、现在、未来具有基于实践过程的一体化、连续性特征,展现出动态演进、不可分割的整体面貌。

然而,在审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叙事时可以发现,西方意识形态包装的“先进性”叙事掩盖了资本逻辑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过程。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②这种以断裂性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实质是资产阶级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强加于其他民族的暴力过程,无形中割裂了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固有的关联与承继关系。一言蔽之,就现代与传统、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联而言,西方历史观在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赋予现代性以“断裂”的特定内涵,认为现代是对中世纪传统的一种背离。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③相较于西方历史观叙事中传统与现代割裂的倾向,习近平大历史观贯穿马克思的历史考察方法,倡导“贯通把握历史过去、现在、未来”^④。一方面,“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⑤,另一方面,“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⑥。历史不仅与现实关联,也与未来紧密相连。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凝聚的民族意识、心理特征以及品格特质,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与价值体系,这些元素在无形中塑造着中国人民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此,习近平大历史观主张赋予现在以“扬弃”的意义,强调现在是对历史过去、传统的继承性超越,并要求“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⑦。

对于传统与现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做了精辟例证,他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联,有力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的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⑧可见,习近平大历史观呈现出一种贯通性、开放性的历史视野,它不是对历史认识时间的单纯延长或宽泛化理解,而是将“历史—现实—未来”视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同时,习近平大历史观秉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旨在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中维系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避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断裂式演进。

(二)大历史观在共时性上具有多元并蓄的开放视野

历史观内蕴着历史发展道路是一元化模式还是多样性演进的问题追思。在回答以何种路径发展时,习近平大历史观始终坚持“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⑨。它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⑩展现出跨越国界、融合多元的历史洞见,进而在历史观维度有效解构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片面历史认知,为理解历史进程提供了更为宽广而开放的视野。

一直以来,西方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先驱,其发展历程往往成为多国现代化探索的参照模板。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奉为圭臬,视其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唯一标准范式,并断言全球历史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⑤《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1—262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⑨《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页。

⑩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遵循着一条向西方模式趋同的单一发展路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单选题。在这一叙事下,东方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进程被边缘化,被描绘为相对滞后、原始、停滞乃至专制的象征,仅作为西方现代化宏大叙事中的附属,“而且还被纳入西方中心史观的历史进步体系和历史发展模式里进行评估和再评估、建构和被建构”^①。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在时间维度上构建了一种看似永恒的共时性逻辑,即西方主导、他者依附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被视为唯一的道路。然而,这一视角忽视了“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②,忽视了每个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贡献与自主选择能力。

与之相异,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空间上构筑起包容开放的视野,反对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认为各国在依据本国实际情况自主探索发展路径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都值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能够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标准。相反,各国基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社会结构,各自探索着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历史道路,这一过程使得“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即全球历史实践展现出一种并行发展的鲜明特征。

实践充分证明,世界历史作为东西方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其演进轨迹显著区别于单一向西方模式趋同的简化论调,而是展现为多国共同编织的复线谱系。兼收并蓄的发展样态是对“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④的有力论证,也是对全球历史发展多样性的高度认可与尊重。习近平大历史观倡导的是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视野的叙事,它鼓励各国在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打破壁垒,深化交流,加强合作。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大历史观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引领全球现代化进程向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同、可持续的未来方向迈进。

质言之,习近平大历史观以其独特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为全球历史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差异,坚决反对排他性的一元史观,致力于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历史图景。在这一视域下,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行为,而是全球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理论思维的科学性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契合的科学方法是大历史观科学性与辩证性的关键尺度,具体体现在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准确洞察历史发展的真相和原貌;坚持具体分析,主张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情景和条件;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要求系统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

(一) 强调准确洞察历史发展的真相和原貌

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是大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共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⑥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具有内在规律的客观存在,其客观性与确定性不容置疑。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倾向于无限扩张历史阐释中的思想意义维度,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运用“碎片化”策略,对史料进行非历史性的抽象放大或刻意遮蔽。一些人出于特定目的,试图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以偏概全地否定任一阶段的历史贡献。他们或是以改革开放后的成就贬低前期的探索与努力,或是以前期的困难挑战质疑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尤其是企图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历史观的迷惑性,体现在其自我标榜的“中立”立场上,声称对历史事件不偏不倚。然而,从史料运用上看,尽管这些人对部分历史表象进行了征引,却未能全面、深入地挖掘历史真相。倘若仅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审

①涂成林:《历史阐释中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问题——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9—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视,则可能形成历史认知的镜像化误读——将碎片化的历史表征等同于历史本真性。

基于此,习近平大历史观秉持“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①的原则,强调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还原历史发展的真相和原貌并坚持历史的客观性。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和美化侵略中国战争的言论,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②,“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和事实”^③。习近平大历史观坚决反对对历史进行歪曲与割裂的错误观点,它强调应以历史的真实图景为依据,从确凿、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理解与评价。质言之,习近平大历史观是植根于对社会历史事物内在联系洞察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它体现了对历史真理性与科学性的不懈追求。

(二) 注重科学考察历史发展的情景和条件

对于历史事物来说,“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④。这些特殊矛盾和本质并非孤立存在的,其生成与演变也非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与即时情境的影响。习近平大历史观主张,对于任何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⑥其演变脉络与发展方向。这种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法与列宁提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⑦原则是一致的。

习近平不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而且将该原则灵活地运用于不同历史事件的分析中。他主张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⑧,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他也强调在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时,要将具体事件置于其所在的历史长河中,如要“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⑨。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习近平同样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法,“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⑩同时他也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⑪与此同时,在对近代以来革命领袖的功过评价上,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强调“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⑫,要随着时代发展和认知提升进一步阐发概括。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同样适用于对一切历史问题的评价。

(三) 要求系统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⑬事物本质蕴含矛盾对立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审视与评价历史时,必须坚守矛盾分析法的原则,采取辩证视角,深入剖析历史现象及其进程中的对立面。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辩证性在于强调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要求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明确“重点论”的核心地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

③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57页。

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⑧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页。

⑨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01页。

⑩《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页。

⑪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

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⑬《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2页。

之所以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其根本原因在于,面对浩瀚无垠且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人们既不具备详尽探究每个历史事件细枝末节及其全部演变历程的能力,也没有这种必要。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事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若试图对每个事件都进行深入研究,往往难以捕捉到历史发展的主流脉络。因此,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从宏观角度审视历史,把握其整体趋势和核心主题。一旦形成了对历史的宏观认知与趋势把握,便能对繁复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那些已丧失客观必然性的表象性、偶发性实例,进行真伪辨识与再筛选,实现从史料真实性向历史真实性的跨越,进而真正赋予史料以历史价值。

坚持重点论,重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并不意味着对历史进程中次要线索与曲折历程的忽视或回避。习近平大历史观还强调要坚持两点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历史发展中的失误。在全球历史视野下,“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其发展征途同样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②,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切实履行对人民的职责,关键在于其对自身错误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对于包括党的领袖在内所犯的错误,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勇于承认、深入剖析并坚决改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③。习近平主张,面对党的历史错误与社会主义发展波折,应采取既不回避也不夸大的科学立场,强调历史审视应“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④。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救亡图存、兴盛繁荣及强国梦想的伟大实践及其累积的宝贵经验,构成了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它们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繁荣的基石与动力。至于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失误与挫折,则符合事物发展螺旋上升与道路曲折的普遍规律,它们非但未削弱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反而为后续的奋斗历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智慧启迪。

三、理论立场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内蕴的鲜明特征和理论底色。“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⑤,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重点回应的问题。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为核心,批判了将群众视为“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⑥的思想观点,澄清了历史主体及其动力机制的谜题。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大历史观遵循着“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⑦的价值取向,在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活动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⑧,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崭新的时代内涵与语义,在理论立场上彰显出人民性。

(一) 高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

既往哲学思潮或视历史为“普遍理性”的产物、英雄主导的过程,或归结为纯粹的“偶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⑨这一论断奠定大历史观人民性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演进中的核心地位,从而确立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主体力量,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习近平大历史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1页。

③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⑤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⑧《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观作为唯物史观的深化与拓展,内蕴着人作为历史主体能力提升与全面发展的基本尺度,主张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动力。这一立场有力反驳了西方现代化历史观中少数精英人物决定历史走向的狭隘观念,同时也对西方人本主义以抽象不变的人性来评判历史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与回应。

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下,传统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以及轮流执政的选举机制被视作民主实践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然而,这一机制的民主运作逻辑正悄然蜕变,其公正性正被政党背后庞大的资本势力与利益集团所侵蚀,逐渐演变为一场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隐秘博弈。在此过程中,资本不仅操纵了信息流通与舆论导向,还控制了选民的选择空间,将选民权利简化为一种周期性的投票行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政党间的更迭往往掩盖不了资本作为恒定受益者的事实,难以有效保障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与真实需求。这种政治舞台上的轮转,即便标榜着民主与人本,但在私有制的根本框架内,民主选举机制往往沦为少数掌权者巩固其地位、服务于资本利益而非广泛民众利益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①由此观之,西方历史观念中长期存在的精英阶层主导历史进程的偏见,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导致其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精英与特权阶层的驱动,而非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

与西方的精英史观不同,习近平大历史观始终将人民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②,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华文明辉煌成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在回答谁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上与之划明了界限。从本质属性看,习近平大历史观将历史主体定位从抽象的“类存在”具象化为当代中国十四亿多人民的实践创造,既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又彰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本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性质,决定了历史叙事必然以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坐标。习近平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③,“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④。大历史观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分析的出发点,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始终强调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到数字经济新业态兴起,每个重大历史转折都印证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之,“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⑤,“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⑥。可见,习近平大历史观以其对历史全貌的洞察,全方位地凸显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铸就了其鲜明的人民性特质。

(二) 强调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经济关系的驱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⑧。对利益的追求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人民群众在客观世界中开展的劳动实践,其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可见,人民的利益需求是历史活动开展直接动因,是推动历史前行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人民在谋求并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人民利益至上”可以说是人民至上的核心要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⑨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初,便代表并维护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等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②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⑤《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历史观的核心聚焦于揭示主体驱动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组织框架下,两党制与多党制下的选举竞争机制,构成了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关键渠道,其设计初衷在于通过民主程序的形式调和利益冲突。然而,这一机制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人民性”的表象而非其实质。西方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少数集团或寡头控制下的“资本逻辑”狂欢,而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在此过程中往往难以被有效整合、充分反映及切实捍卫。西方剥削阶级政党,无论其如何粉饰自我形象,其本质始终难以超脱于少数社会利益集团或特权阶层的立场,其行动与决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维护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而非广泛的社会整体利益。

相较于西方现代化历史观以少数利益集团诉求为发展导向,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①,切实满足人民利益诉求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从历史必然性看,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本质上是领导人民实现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已确证只有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实现最广泛人民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依靠工农联盟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动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改革开放释放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系列历史实践本质上都是人民意志与利益需要通过历史合力的现实化过程,铸就了大历史观与生俱来的人民立场;在客观现实性层面,当代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一历史方位本身即蕴含着对人民主体力量的时代召唤——科技创新领域的工程师红利、基层治理中涌现的“枫桥经验”等,无不印证着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力量。这种人民性特质在理论深层表现为历史规律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既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客观规律,又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设计确保历史发展始终沿着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演进,从而在历史观层面实现了对“英雄史观”与“虚无史观”的双重超越,构筑起历史必然性与人民主体性辩证统一的认知框架。

(三) 坚持依靠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人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展现出一种“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自觉的能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呈现出非静态恒定的样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影响历史运动进程的因素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虽然“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忽视人类意志与自觉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习近平大历史观倡导充分利用人民群众汇聚的宏伟历史创造力,将这种内在精神力量和需求意志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驱动力,旨在不断激发亿万劳动人民变革历史的主动性、创造性,从而积极适应并主动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党的领导与依靠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紧密结合起来,聚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磅礴合力和前进动力。“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④习近平大历史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在历史性发展进程中的诉求,积极探寻并践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科学路径,以此强化并提升自身的全球历史变革领导力。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在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同时,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不仅涉及对客观物质条件的变革,还深刻体现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实质,即勇于从内部寻求变革与完善,持续推动自我革新。通过践行历史主动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打破社会历史条件对革命主体的束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将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内化于行动之中,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由自发革命向自觉革命的深刻跃迁。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性特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21世纪的理论结晶,是社会主义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4页。

制度优越性的认识论表达,更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价值内核。这种特质的确立,既源于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深刻把握,更体现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①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当西方陷入“历史终结论”的迷思时,习近平大历史观正以其鲜明的人民性特质,为人类探索更合理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结语

习近平大历史观融通了中国传统历史观、扬弃了西方历史观以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②,具有开放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等鲜明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大历史观既对指导当下社会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推进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持续演进与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大历史观必将贯通古今、联通中西,展现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视野,释放出愈加强劲的思想伟力与实践效能。

深化对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既是我们积极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也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的行动自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应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大历史观所蕴含的理论品格,自觉运用其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通过以史为鉴、向史而新的辩证思考,深化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认识,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唯有在古今中外的时空维度中、在鉴往知来的实践逻辑中强化历史担当,方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开创事业新局,以历史主动精神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Xi Jinping's Grand Historical View

HUANG Jiawen & WU Qingsh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Grand Historical View constructs a multi-linear historical genealogy that highlights openness, scientific rigor, and people-centeredness. Theoretically, it is a continuous and pluralistic historical outlook that unifies historical traditions with modernit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global consciousness, aiming to integrate ancient and modern perspectives, while harmonizing Chinese and glob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which presents the openness. Methodologically, it demonstrates scientific rigor by adhering to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issue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intain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duality and priority, enabling precise discernment of historical truths,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developmental contexts, and scientific grasp of historical essence. Ideologically, it highlights people-centeredness through upholding the people's principal status in the dialectical interplay between objective historical laws and human agency, fully embodying the people's will, safeguarding the people's rights, and stimulating collective creativity throughout historical processes.

Key words: Xi Jinping's Grand Historical View; openness; scientific rigor; people-centeredness

(责任校对 曾小明)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1页。

②黄加文,巫青山:《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创新与超越》,《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